



◎叶向阳 著

英国17、18世纪 旅华游记研究

A Study of 17th- and 18th-century
British Travel Accounts of China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本书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资助出版



英国17、18世纪 旅华游记研究

A Study of 17th- and 18th-century
British Travel Accounts of China

◎叶向阳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17、18世纪旅华游记研究 / 叶向阳著. —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135-2939-6

I. ①英… II. ①叶… III. ①中英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IV. ①D82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0277号

出版人 蔡剑峰
责任编辑 陈宇
执行编辑 方宇荣
封面设计 孙敬沂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5
版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5-2939-6
定价 66.00元

购书咨询: (010)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 (010)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229390001

序一

《英国 17、18 世纪旅华游记研究》即将付梓，叶向阳索序。作为他曾经的老师，我自是义不容辞，也很高兴能有机会为他的书写几句话。

这一部书，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它以 17、18 世纪英国旅华游记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这些游记塑造了怎样的中国形象以及形象的成因。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题目。在我看来，这个意义主要就在于选择了游记文本来进行形象研究。

游记，是一种散且泛的书写。所涉之广，几乎集史地、自然、人种学、人类学、民俗学、文化学、哲学、文学于一身。这样驳杂的作品，显然不属于纯文学。因此在一般的文学史中，游记往往难登大雅之堂，而被西方文体学索性划归在“副文学”一类中。然而这种驳杂，恰恰导致了它的“跨越性”，于是便使游记成为了比较文学十分钟爱的文类。

本义上的游记当然是指对旅行者旅途中所见所闻的记录。而旅行，因为是在地理空间与历史时间中的位移，与生俱来就具有“跨越性”。比较文学所关注的国际旅行则不仅是在时空中的位移，更是在不同社会体系、不同文化秩序中的位移，它的跨文化意义便愈显突出。我们因此有理由说，游记作者其实就是一个文化比较者。当他行走在异域的土地上，无论有意无意，愿意不愿意，他都无法回避“我”与“他者”的比较，时时、事事都要直面“相异性”与“认同性”的对质、对峙与对话。而其作品一旦进入阅读领域，更会推动受众的思想从停滞走向运动，从孤立、封闭走向与他者的相

互比照，从而使人们具有了相对意识，具有了“他者”、“异域”，乃至于“世界”这样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游记记录的就不仅仅是旅行者个人旅途中的见闻，它同时也记录下了一个民族在一个特定时期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过程和水平。

比较文学以研究“文学中的文化交流”（季羡林）为己任，自诞生之日起就青睐这些记录了与外国文化亲身遭遇的游记文本，视其为异国文化的见证与传播媒介。如果说在传统研究中，游记还只是媒介学的研究对象；那么，随着本学科的发展，神话研究、形象研究这些在20世纪下半叶发生了重大变革的分支学科也都对游记表现出了愈来愈浓厚的兴趣。

形象研究对游记的兴趣当然不自今日始。游记大量记录、描述异国与异国人，也就必然引起早期形象研究者的关注。法国学者卡雷著名的“游记—形象—幻象”三段式表述，就再明确不过地揭示出了传统“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对游记的重视。然而，当代研究已经不再满足于勾勒、描述、总结游记中的异国形象，也就是说，不再止步于回答“形象是怎样的”这一以描述为主的问题，而是将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形象成因的思考和探讨上，更多地关注起“形象为何是这样的”这一偏重分析性的问题。这种重心的转移，既是研究深化的必然，也与形象研究的现代转型有关。在当代理论的关照下，人们愈来愈重视形象塑造者主体，也愈来愈认识到游记在塑造异国形象时所具有的特殊功能。

功能之一谓之曰“折射社会总体想象”。作为社会中的人，游记作者在遭遇异文化时不可能不受制于社会总体想象，或多或少都会带着某种“先入之见”来读解异国。他们笔下对异国的描述与思考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集体想象的投射物。

功能之二谓之曰“生成新形象”。与异文化的直接接触，往往会给作者带来感官和思想的冲击，从而校正作者头脑中固有的“社会总体想象”，生成新的异国形象，或至少带来新因素、新意义。

游记由于记录下了最生动、最鲜活的经验，也就最有可能塑造出个性化形象。而游记作品一旦进入阅读领域，便会导致这些新形象（因素、意义）的扩散和传播。这种传播的速度和广度都是其他文类所难以企及的。

这就不能不提及游记的“自传”色彩。以“我”为叙事者的游记，具有第一人称叙事的全部正、负面效果。它记录“亲见、亲历”，因而对读者更具亲和力、诱惑力，当然也就更具迷惑性和欺骗性，最易获得读者的信任。

毋庸讳言，我们对这种“自传”色彩是需要保持高度警惕的。如同任何“纪实性”写作一样，游记也是经过作者文化过滤与选择（言说与不言说）后的一种“重写”。它并非逐日、逐时完整的“实录”，而是经过“我”的重组、整理、等级化……等一系列运作的。外部世界的各种条件、需求、“定见”，各种力量博弈、利害关系，作者先在或即时的观念、心态、情感、兴趣，都会参与到这些运作中来，纵横交错地作用于作者的“选择”。

但无论如何，游记作品在形象塑造方面仍是最具“创造力”的，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会或多或少反作用于“社会总体想象”。它以一种解构的方式，造成某些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与历史的断裂，由此颠覆那些“先入之见”，对传统起到某种匡正、革新的作用。

实际上，游记作者往往扮演了双重角色：他们笔下的异国形象既折射出社会总体想象，同时也不乏新面相、新因素。因而他们既是传统观念、定见的代言人，又会成为新形象的建构者、鼓吹者、始作俑者。

由此可见，对游记文本进行形象研究具有相当的挑战性。而向阳的书可以说在以上诸层面上都做出了努力。作者在绪论中就明确提出，他的书要对17、18世纪英国旅华游记进行“全面清点”，对作品所塑形象“逐个归纳并相互对比”，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形象生成的各种原因及其历史演变过程”。应该说，这个标尺定得相当

高，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作者对形象研究的现代转型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

纵观全书，作者基本上完成了对本书的自我设计。从17世纪英国关于中国的第一部旅行报告《彼得·芒迪欧亚旅行记》到19世纪初期出版的约翰·巴罗的《中国旅行记》，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对二百年间英国人旅华游记中的中国形象较为完整的报告。在对这些形象进行勾勒和分析时，作者有意识地去关注形象不断演变的过程，讨论形成并制约这些演变的各种历史、政治、文化因素，揭示游记作者自身的“人差”。这样，他也就为我们展示出了处于欧洲近代化过程中的英国人对中国的认知过程。

谁都知道，对两百年间的英国游记文字进行全面清点绝非易事，遑论还要勾勒形象的演变过程。这后一个目标的设定，大大增加了作者的阅读量和工作量，所涉文本就绝不仅仅是英国游记，更有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出版的同类书籍，还要兼及各种相关的史地、文学、杂纂等作品。凭借着较好的外文功力，向阳数年间埋头检索、查阅了大量文献。本书所涉西文资料之多，实为多年来所罕见。这种尽其可能对西文“原典”的把握，为他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他有足够的事实依据来进行“归纳”和“对比”，把握形象演变的过程，并且可以底气十足地点评前人的工作，包括对各种错误和缺憾的校勘。本书对前人研究的诸多精细考辨，所设立的两千余条注释，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堪称是本书的一大亮点。这些靠第一手资料踏踏实实进行的研究，要远比那些仅以译本为对象的论文，或充斥着二三手资料的煌煌巨著更值得信赖，也更具有学术价值。

相比之下，本书对形象成因的分析似略显单薄，对理论的引用也稍嫌偏多。这大概与作者的知识结构、理论基础不无关联。应对如此复杂的课题，作者或许还需经受更多的历练，积累更多的相关知识，方可达到将现代理论“化”入自己研究的境地。其实，国内

近年来出现的大批形象研究的硕博士论文，似乎都存在着类似问题。作学生时，为了学习理论，只得按给定的条条框框循规蹈矩一步步去做，或征引权威话语以增加自己研究的象征价值。但那仅仅是一种学步的方式，只在一个阶段内有其存在价值，万万不可终身沿用，变成一种研究套路。

在我看来，一部博士论文或一部专著，必得要用“顶天立地”去做标准，才会真正具有学术价值。所谓“顶天”，就是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有一套足以分析、研究、解决此问题的理论和方法论；所谓“立地”，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去把握第一手资料，从阅读手稿或从文本源头做起，认真地搜集梳理校勘材料。不过，这个词恐怕还是写作“立地顶天”更逻辑些。因为无论为人还是为文，“立地”都是基础。只有脚先踩结实了，才好去够天。否则“天”顶得再高，脚却悬在半空，终将一事无成。可惜，老祖宗们敬“天”畏“天”，生把这个词弄颠倒了，后生晚辈们也就只能循着这老理，“约定俗成”地接着说。尽管如此，“立地”为先的道理却是不言而喻的。向阳的书“立地”立得结实，“顶天”的基本目标也已达到。只不过，我们有理由希望他能踩在那个结结实实的地上，继续扩大自己的知识场，升华对理论的理解与感悟，让“顶天”与“立地”同样精彩。

在我的学生中，向阳的乐天和好动是出了名的。我和学生们聚会时，向阳永远都是人未到而声先至。听到走廊尽头传来大嗓门的问路声，哈哈的大笑声，就知道叶向阳君到了。随后，便会见他兴致勃勃、大汗淋漓地提着那辆价格不菲的跑车，以一身运动员的行头现身：头盔、紧身衣、运动鞋、背囊……一应俱全，好像刚刚参加完比赛。

他爱运动。这运动，不仅是每天不辞辛劳地骑爱车数十里往返上下班，还有周末不时地去登山。据说他把北京郊区和河北省的高山都登遍了，还数次“遇险”，也曾有在大山中迷失方向而断粮断

水风餐露宿的经历。说起来，他还真有点旅行者的探险精神，这怕也是他选择游记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动因？

与探险精神相关的，是他对未知世界无穷的兴趣。课堂上，会场里，他永远都有问不完的问题，永远都在兴高采烈地与别人争辩。他的好奇心与探险精神，他的乐观与通达的性格，都是他的一笔财富，会助他在学术之路上走得更远。

孟华

2012. 2. 24

Preface

序二

[美]康士林 (Nicholas Koss) 撰 叶向阳 译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England ruled the world. By the end of the century, nearly 20%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was under its control. It was also in this century that England came into bellicose confrontation with China during the Opium Wars of 1841 and 1856, which forced China, by the sale of opium to it, to solve England's trade difficulties in India. How was it that such a principled country as England was able to enforce its unprincipled will on China? Part of the answer must lie in the images of China that England had in the years before the Opium Wars.

在19世纪英国统治了整个世界。到19世纪末，世界人口的近20%在其控制之下。也正是在这个世纪，发生了1841年与1856年的两次鸦片战争，英国陷入了与中国的军事对抗。通过战争，英国迫使中国认可其向中国输入鸦片，以此来解决英国在印度贸易中遭遇的困境。像英国这样一个有原则的国家怎么会把其无原则的意志强加给中国呢？其中部分的答案一定可以在鸦片战争前英国的中国形象里找到。

This book by Dr. Ye Xiangyang is of immense help in explaining England's image of China in the two centuries before England achieved mastery of the world in the 19th century. To date, no single book, either in Chinese or English, has discussed altogether the twenty travel

accounts written in England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that offer England's image of China. From his detailed and perceptive reading of these accounts, Dr. Ye has presented so clearly the at times very negative picture of China that was presented. From these image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imagine how England then in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would not be adverse to treating China as she did during the Opium Wars.

叶向阳博士的这本书，对于解释英国在19世纪独霸世界之前两个世纪的中国形象，有巨大的帮助。迄今，无论在中文或英文世界，尚无一本书同时讨论了17、18世纪创作于英国的这20部游记，而正是它们塑造了英国的中国形象。叶博士通过对这些游记的细致而富有洞察力的阅读，清晰地展现了作品中所反映的往往是非常负面的中国图景。基于这些形象，我们就不难想象英国在19世纪中叶是如何无所顾忌地延续鸦片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来对待中国的。

Dr. Ye is to be congratulated for his thoroughness in gathering these English accounts. He spared no effort to locate all of the extant English travel accounts to China from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His selection of the use of the French approach to imagology to study these books is most appropriate too because of its emphasis on the context of the image in the receiving country. He also had the good fortune to be trained by Professor Meng Hua, the leading scholar of French imagology in China.

叶博士能如此全面地收集到这些英国材料，让人欣喜。他曾竭尽全力地搜寻现存的17、18世纪英国旅华游记。他选择了法国研究形象的方法来研究这些作品也是非常恰当的，因为法国的形象学强调形象接受国的文化语境。他还有幸师从孟华教授，孟华教授是中国研究法国形象学最重要的学者。

One of the strengths of this study is the inclusion of works that have been either not or rarely discussed before by domestic or international scholars, books such as William Dampier's *A New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1697), Alexander Hamilton's *A New Account of the East Indies* (1744), Charles Lockyer's *An Account of the Trade in India* (1711), and Charles Frederick Noble's *A Voyage to the East Indies in 1747 and 1748* (1762), etc.

本著的一个长处是涵盖了此前国内外学者很少或根本没有研究过的作品，诸如汉密尔顿的《新东印度纪事》(1744)、洛克耶的《在印度贸易纪事》(1711)以及诺伯尔的《1747—1748年间的东印度地区航海记》(1762)，等等。

For me, the highpoint of Dr. Ye's study is his analysis of books related to Macartney's Embassy to China during the reign of Qianlong. These include Lord Macartney's *An Embassy to China*, which was not published until the 20th century, George Staunton's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to China* (1797), Aeneas Anderson's *A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1795), Samuel Holmes' *The Journal of Mr. Samuel Holmes* (1798) and John Barrow's *Travels in China* (1804).

在我看来，叶博士本著最精彩的部分是他对乾隆朝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相关作品的分析。这些作品包括直至20世纪才出版的马戛尔尼勋爵的《访华使团》、斯当东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1797)、安德森的《英国使团访华记》(1795)、霍姆斯的《塞缪尔·霍姆斯先生护卫马戛尔尼使团的日记》(1798)以及巴罗的《中国旅行记》(1804)等。

I had the pleasure of meeting Dr. Ye for the first time when he was a doctoral student. Professor Meng Hua who knew of my great interest in England's image of China invited me to have dinner with her student who was working on this topic. Since that time, I have been in regular touch with Dr. Ye, often discussing matters related to England and China. Some of Dr. Ye's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that have always impressed me are his determination to get answers no matter what the

question and his skill in pointing out weaknesses in the arguments of others.

我首次遇见叶博士时，他还是位博士生。孟教授知道我对英国的中国形象有浓厚兴趣，就邀请我与她的这位正在做此课题的学生共进晚餐。自那以后，我与叶博士保持经常的联系，常常讨论涉及英国与中国的一些问题。叶博士的一些特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例如他追根刨底的精神以及善于指出他人研究中的缺点的能力。

This book is based on Dr. Ye's dissertation that was presented to the Institut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of Peking University. I had the privilege to be present at the oral defense, during which Ye Xiangyang admirably defended what he had written. He stood up well under intense questioning, and also gracefully accepted suggestions for revision, which have been made in this now-to-be published book.

本书是在叶博士提交给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润色而成的。我有幸参与了他的论文答辩。在整个过程中，叶向阳出色地为自己的论文做了答辩。在诸多的质疑面前，他回答得自信而圆满，同时虚心接受了关于论文修订的建议。这些建议都体现在了这部即将出版的著作里。

My hope for Dr. Ye is that, given his excellent command of English, he will now prepare portions of this book to be published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我对叶博士的希望是，基于他优秀的英文水平，他现在应该把本书的一部分加以整理以便在英语世界发表。

康士林 (Nicholas Koss)
台湾辅仁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2011年12月20日于北京大学

内容提要

本书采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对 1637—1794 年间（即英国旅华游记萌芽时期和第一个繁荣时期）旅华英国人迄今已出版的全部 20 部游记（或相关报告）所塑的中国形象进行全面的考察，并参照对比了同时代英国其他文类文本以及当时法国等其他西方国家旅华游记的相关描写，在一个较为宏大的视阈内探讨这些英国游记作者所塑中国形象的特色，这 150 年间英国旅华游记所反映的中国形象演变的轨迹以及这一演变在跨文化关系上的意义。

本书的主体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回顾了 1637 年前的中英关系及英国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为后文的研究作了史的铺垫。第二至四章对本期三个阶段内的英国旅华者及其游记文本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专门阐述。在全面梳理、归纳这些游记中所反映的中国形象之先，笔者通过总结该阶段英国关于中国的各种出版物与社会思潮来勾勒当时英国对中国的社会集体想象。在分析这些游记所塑中国形象的过程中，笔者往往会与其他类型作品所塑造的中国形象进行对比，以探讨文本的“互文性”及其在塑造中国形象方面的继承性与独创性等问题。第五章对本期英国旅华游记所塑中国形象的三个发展阶段或演变过程进行了总结，并对形象生成的复杂性和规律性等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在考察形象生成的复杂性和规律性时，笔者特别强调既要重视英国的社会历史文化及其发展状况，也不能忽视中国的历史文化及社会发展背景，因为非虚构游记写作的特色就是不脱离实际。这个实际当然既包括注视者，也包括被注视者，而后者往往为当代中国形象的研究者所忽视。

总之，本书在以下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意义：一、首次对本阶段的英国旅华游记文献进行了全面挖掘与整理；二、在游记与形象研究的方法论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三、在原典实证的基础上纠正了中外学者在有关论述中的一些错误或不足之处。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1637 年前的中英关系及英国对中国的认识与态度	39
第一节 中英关系的酝酿和尝试	40
第二节 1637 年前英国对中国的认识与态度	47
第二章 英国旅华游记的滥觞：从芒迪到贝尔（1637—1721）	88
第一节 1637—1721 年的中英关系与英国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	88
第二节 本阶段游记中的中国形象	121
第三章 英国旅华游记的发展：从安逊到马戛尔尼使团 访华前（1742—1790）	200
第一节 1722—1790 年的中英关系及英国对中国的认识与态度	200
第二节 本阶段游记中的中国形象	239
第四章 英国旅华游记的繁荣：马戛尔尼使团（1793—1794）	303
第一节 使团访华前后的中英关系及英国对中国的认识与态度	303
第二节 使团游记中的中国形象	330
第五章 英国旅华游记的中国形象研究若干问题初探	419
第一节 中国形象的比较与总结	419
第二节 中国形象成因的复杂性初探	437

结语	465
参考书目	477
后记	501